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床前明月光，

舉頭望明月，

疑是地上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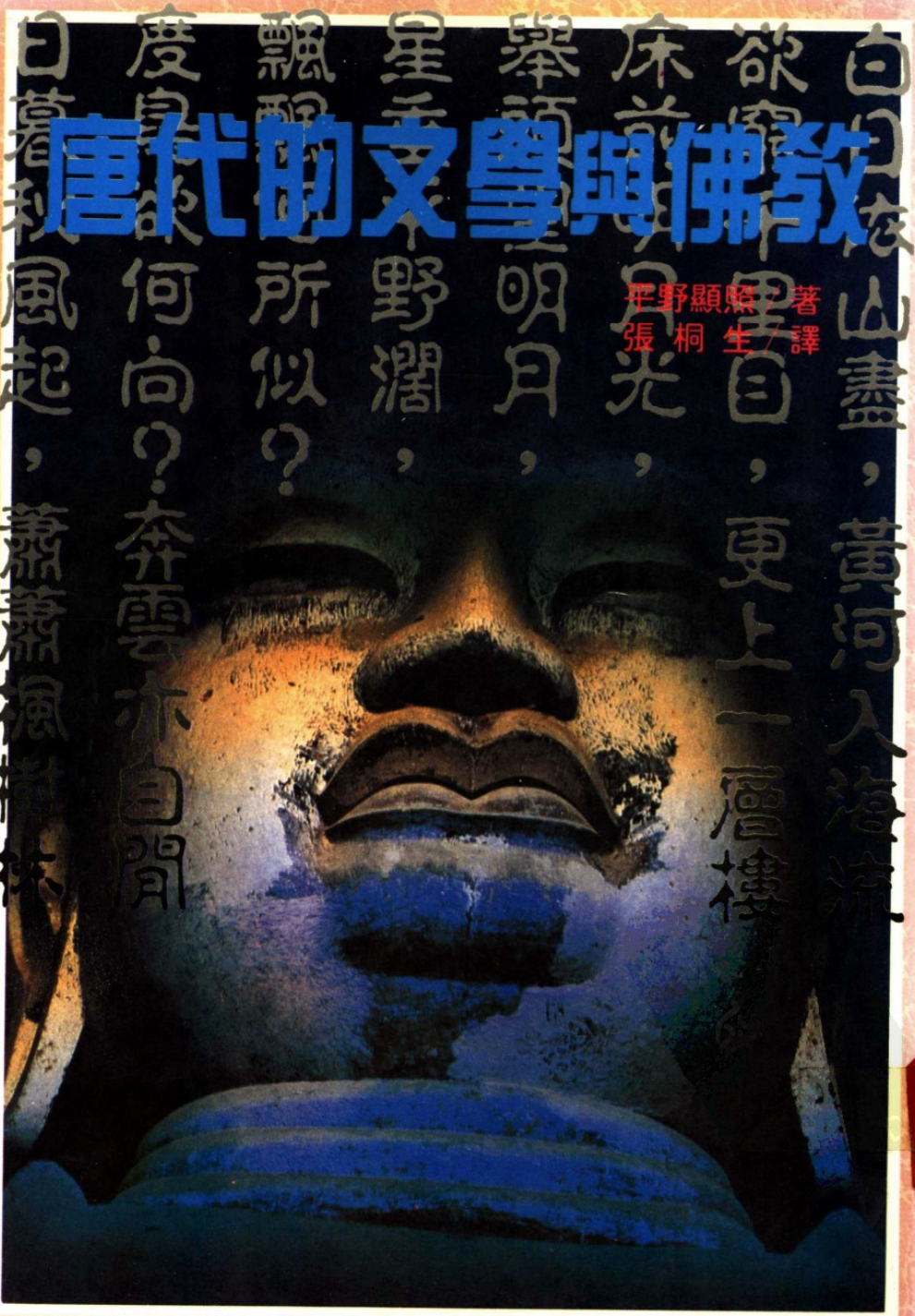
舉頭望明月，

度身欲何向？奔雲亦自閒。

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

著譯
照生 / 張桐
顯野 / 平野

唐代的文學與佛教



平野顯照 / 著

唐代的文學與佛教

張桐生 / 譯

業強出版社



新知叢刊 1021

唐代的文學與佛教

作者：平野顯照
譯者：張桐生
出版者：業強出版社
發行人：陳春雄
主編：林憲正
編輯：溫月美·王中和
美編：陳宣銘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2段163巷16號
電話：(02)3043152·3043153
郵撥：0743812-9

總代理：大鴻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溫州街48號
電話：(02)3217947·3419187
郵撥：1090641-1

打字：健弘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永美印刷公司
裝訂：佳合裝訂廠
定價：新台幣170元整

新聞局登記證版台業字第3220號
1987年5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缺頁，請寄回更換)

譯者序

我對唐代文學只具備基本的知識，對佛教也未曾專攻，不過，在日本十幾年來閱讀的累積，使我對日文意義的把握還算有自信，而且，也許是因為個性的關係，我比較喜歡翻譯這種理論性的學術論文……，這些原因就是我所以下這本書的契機。

翻譯的進行還算很順利，自覺每一句都是在前後的意思完全貫通理解之下才下筆的，文章的表現也盡量配合了中文的思考和表現的方式，其中有不少需要查原文的地方，曾向林明德教授和藍吉富先生請教或借閱原書，這也是應該感謝的事。

就像神田喜一郎先生在序中所說的，作者平野在書中所表現的學風是平實而穩健的，雖然他所看到的問題有時不免使人有平凡瑣碎的感覺，可是，他所提出的每一個問題都是出自他個人的發現、領悟和體認，使人感覺到書裏躍動著研究者的個性和生命，這大概就是作者學術研究的原點吧！

張桐生

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于福州

序

神田喜一郎

魏晉以來，佛教逐漸滲入中國社會，中國的文學家有的皈依佛教，有的對佛教懷抱著深度的關心，受佛教影響的人非常多。晉的孫綽，梁的劉勰，北齊的顏之推，唐的王維、柳宗元、白居易，宋的蘇軾、黃庭堅，明的宋濂、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等可以說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其他如果要再舉出來的話，那就數不勝數了。

在另一方面，晉的支道林，唐的寒山、皎然、禪月，宋的道潛、惠洪，明的來復等繇流文學家也相繼輩出。中國文學與佛教之間的密切關係是不容否定的。它們之間的關係還不止於此，以一般大眾為對象的變文、小說、戲曲等俗文學也都與佛教有著深厚的關係。尤其是變文，原來就是從佛教產生出來的東西，這樣看來，把中國文學與佛教的關係拿來和西洋文學與基督教的關係相提並論也不算過言。離開了佛教，我們無法談論中國文學，這個道理雖然十分明白，可是，到目前為止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對這一點有著正確的理解而特別留意的人，在我知道的範圍內是非常少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本書著者平野顯照君的存在，其意義就非常重大了。

平野君是在大谷大學專攻中國文學後，一直在該大學教壇講授中國文學的學者。但是，他並不

是尋常一般單只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他充分利用了大谷大學的特殊環境，在研究中國文學的同時，對佛教也作了很深的鑽研，也可以說「他操拿著中國文學與佛教的兩把刀，而且，這兩把刀並不是分開來各別使用，而是渾然融合爲一」，在中國文學的研究上，開拓了嶄新的境地，發揮了獨自的特色。而且，他的學風平實穩健，毫無輕浮之氣，本書的內容最能夠證明這件事。這裏也表現了平野君的人品，我認識平野君近三十年了，他是個學不厭的人，見到本書的出版，我心裏真有說不出的喜悅。

昭和五十三年四月

初出一覽（發表順）

敦煌本講經文と佛教經疏的關係 西元一九六〇年「大谷學報」四十卷二號（大谷大學大谷學會）

敦煌本講經文と佛教經疏的關係（續）西元一九六一年「大谷學報」四十一卷二號

白居易撰釋教碑箋註（一） 西元一九六六年「大谷學報」四十六卷二號

別本太子成道變文について 西元一九六八年「佛教文學研究」（法藏館）第六集（佛教文學研究會）

白居易撰釋教碑箋註（二） 西元一九六九年「大谷學報」四十九卷二號

刻經と寫經——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を中心として—— 西元一九七二年「大谷大學所藏敦煌古寫

經」（續）（野上俊靜編・大谷大學東洋學研究室）

「文選」注にあらわれたる 李善の佛教 西元一九七三年「文藝論叢」一號（大谷大學文藝研究會）

晚唐の文學と佛教——李商隱の場合—— 西元一九七三年「印度學佛教學研究」二十二卷一號（

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

李白と佛教——序說—— 西元一九七四年「文藝論叢」三號

唐代小説における佛教の様相 西元一九七四年「印度學佛教學研究」二十三卷一號

「金粟如來是後身」について 西元一九七五年「文藝論叢」五號

李白と佛教——承前—— 西元一九七六年「文藝論叢」七號

廣宣上人考（上）——唐代詩僧傳—— 西元一九七七年「大谷學報」五十六卷四號

廣宣上人考（下）——唐代詩僧傳—— 西元一九七八年「大谷學報」五十七卷四號

譯者簡介

張桐生

- 民國三十五年生。
- 湖南省醴陵縣人。
- 東海大學歷史系畢業
- 日本廣島大學大學院西洋史研究所畢業。
- 現任日本西南大學兼任教師。
- 譯有「貝原益軒」、「山崎闇齋」、「絲路與佛教文化」、「唐代的文學與佛教」等書。

目 錄

● 譯者序

● 序

● 第一章 白居易與唐代文學 / 1

● 第一節 白居易的文學 / 2

● 第二節 白居易與佛教 / 20

● 第三節 白居易的釋教碑 / 40

● 第四節 廣宣上人考——唐代詩僧之一研究略傳 / 90

● 第二章 佛教用語與李白的文學 / 133

● 第一節 李白詩中的一個佛教用語 / 134

● 第二節 李白與佛教 / 140

● 第三節 李白的佛教詩 / 152

● 第四節 「金粟如來是後身」的語義 / 167

● 第五節 李善的佛教 / 180

● 第三章 唐代的講唱文學 / 197

● 第一節 俗講與講經文 / 198

● 第二節 講經文與經疏 / 214

● 第三節 「金剛般若經」普及考 / 245

● 第四節 變文考 / 268

● 第五節 日本流傳的「八相變」 / 286

● 第四章 唐代小說與佛教 / 305

● 第一節 唐代小說與僧房佛寺及緇徒 / 306

● 第二節 唐代小說與佛教教義 / 317

● 第五章 李商隱的文學與佛教 / 325

● 第一節 李商隱與佛教的機緣 / 326

● 第二節 李商隱與佛教 / 325

● 第三節 李商隱與僧知玄 / 353

● 後記 / 357

第一章

白居易與唐代文學

第一節 白居易的文學

白居易的意外發現

白居易（西元七七二—八四六年）在「與元九（禎）書」（「白氏文集」卷二八）中有下面的一段話：

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自愧，不之信也。及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誦僕詩者，此誠雕篆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

這封書信是在元和十年（西元八一五年）十二月，白居易快要四十五歲時候所寫的，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白居易把自己長年文學活動的成果編集成了十五卷的文集，同時這封信也是白居易在有損名教的罪名下貶為江州司馬，流放潯陽時所寫的（參照前野直彬「韓愈的生涯」一四四頁）。

有關這些事情，在「舊唐書」卷一六六以及「新唐書」卷一一九中也大致有所記載。從上面的書信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問題，而這些問題主要可以歸納為下面兩個：首先，白居易對自己的文學活動所懷抱的期待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反而在意想不到的方向獲得了很高的評價。其次是白居易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盡可能由為政者來讀，可是結果却發現他的作品意外地為進士、士庶、僧徒、孀婦、處女、妓女等廣泛的各階層人士所喜愛。這兩個發現，白居易的知己親友元稹（西元七七九—八三一年）在「白氏長慶集序」中（「元氏長慶集」卷五一）中也提過，白居易的文學能獲得如此廣大讀者的原因究竟在那裡？關於這個問題，誰也沒有提出過適切的答案，他們兩人只是把獲得了意想不到的共鳴這件事直率地記錄下來而已，至於原因的究明則有待後世有識之士的發言。

就像清趙翼在「甌北詩話」中所說的：「是古來詩人及身得名，未有如是之速且廣者。」白居易對當時這種意外現象所表現的驚奇是不難想像的，白居易的文學對當時社會浸透之深廣，大概不是他前面許多有名的詩人所能匹敵。換句話說，白居易作了許多各階層人士都很容易親近的詩，也就是說，過去沒有機會接受文學洗禮的人們，這時也有機會得以享受文學，平易近人的白居易文學

在自然的修辭和調和的音律下又產生了新的發展。

白居易與變文

唐孟棻的「本事詩」嘲戲第七中記載說：

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才見白，白曰：「久欽籍，嘗記得君款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蒂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邪？」張頓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邪？」

透與歡宴竟日。

上面這段記事在五代王定保所撰的「唐摭言」卷三矛盾一條也能見到，事情的經過大致一樣，只是兩者在文字上有許多差異，大概是「唐摭言」在援用「本事詩」的記載時所生的謬誤吧！因為經過情形大體一致，所以在這裡根據「本事詩」來進行考查。

在這段記載中所出現張祜的詩句原來是一首題為「感王將軍柘枝妓之歿」(「文苑英華」卷三〇五)七言律詩中的一聯，而白居易的詩句則是「長恨歌」中的一聯，此外，這段談話的時間是在白居易赴任蘇州刺史寶曆元年(西元八二五年)三月末以後，當時張祜在蘇州令狐楚屬下，白居易到任以後，曾經造訪過令狐楚。

白居易在開頭所說的「款頭」這個詞彙並不是普通的用語，在「唐摭言」中作「問頭」，這也不是熟悉的用語，關於這個用語的解釋，最早有王世貞在「藝苑卮言」卷四所說的：

款頭詩，目連變，破船，衛子如廁，失貓，白日見鬼。固是謔語，然亦詩之病。

在這以前，難道沒有人對這個常用語的意義感到不解嗎？對今天的我們來說，這是一個不容易理解的用語，根據上面王世貞所說的，我們可以把這個用語解釋為「謔語」，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嘲弄語」，有關「問頭」、「款頭」的解釋，蔣禮鴻在「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印行）第三篇裏有詳盡的敘述，在此暫且不提，倒是「目連變」這個謔語有說明的必要：變文是中唐俗文學的代表，倉石武四郎先生在「介紹目連變文以後」（支那學）四卷三號）一文中認為這個用語可以用來證明變文的流行，後來學術界認為白居易在世時，變文已經存在，這個說法很自然的為一般人所接受。

「目連變」既然具有謔語的「即興性」，我們可以想像到「目連變」在變文的名目下是如何地被文士們所排斥，換句話說，在當時的文學界，變文只是用來當作謔語來使用的，張祜既然使用了這個謔語，可以想見他對「目連變」是熟悉的，同時也可以想見他對佛教具有相當的知識，宋葛立方的「韻語陽秋」卷四中有一段關於張祜與佛教接觸的記載：

張祜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歷僧寺，往往題詠，如題僧壁云：客地多逢酒，僧房却獻花。萬道入禪房云：殘陽過遠水，落葉滿疏鐘。題金山寺云：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題孤山寺云：不雨山長潤，無風水自陰，斷橋荒蘚涉，空院落花深。如杭之靈隱天竺，蘇之靈巖楞伽，常之惠山善卷，潤之甘露招隱，皆有佳作。李涉在岳陽，嘗贈其詩曰：岳陽西南湖上寺，水閣松房遍文字，新釘張生一首詩，自余吟著皆無味。信知僧房佛寺，賴其詩以標榜者多矣。

張祜因為在僧房佛寺留下題詠而使他的詩名大噪。他的作品妙味無窮，從這些題詠裏我們可以發現張祜對佛教的積極對應態度以及他沈潛於一種屬於佛教中靈氣的風韻，經常出入佛寺的張祜在談話裏用到「目連變」這個諺語，雖然是偶發的，但也表現了他對佛教不尋常的關心，在「唐摭言」、「本事詩」記載的會話裡，白居易說張祜的「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是「款頭」，張祜則說白居易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是「目連變」。由此看來，張祜不僅熟悉「目連變」這種文學形式，他還精通「目連變」的內容，張祜既然用了「目連變」這個諺語，可見白居易在「長恨歌」裏確實是使用了這種性格的詩句，白居易大概很同意張祜的說法，因為他不僅沒有作任何的辯解反駁，兩人還意氣投合，歡宴終日，張祜指出「長恨歌」中的一聯有類似「目連變」的表現，而白居易坦然的接受了這種批評，所以我們可以說白居易自己也承認他的文學具有廣泛滲透的性格，此外，從白居易的「致元九書」中的告白來看，「長恨歌」已經成了他存在的象徵，所以「長恨歌」在白居易文學中的代表地位應是不可置疑的。

白居易與唐代小說

關於「長恨歌」，我們還要注意的是它與唐代小說的關係，「長恨歌傳」記述了寫作之一端：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日，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熱宦，鴻與琅耶王質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遊仙遊寺，語及此事，相與感嘆。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歌既成，使鴻傳焉。

平岡武夫先生校定「白氏文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刊）認為那波本的「元和元年十二月」之下有「日」字，並將「話及此事」校定為「語及此事」在此根據校定錄下原文，作「長恨歌傳」的陳鴻在題下署名為「前進士陳鴻撰」，關於陳鴻的閱歷，沒有完全的記錄，只能見到片斷的記載，魯迅在「稗邊小綴」（「唐宋傳奇集」所收）裏對此事已有考證，在此不贅述。只是對於「前進士」需要說明一下，「太平廣記」卷四八六中作「前秀才」，可是我們仍然根據平岡先生的校定本，有關「前進士」的解釋，在唐李肇的「唐國史補」卷下中可以見到，後來，王定保在「唐摭言」卷一述進士下篇中引用李肇的解釋並且加以詳細說明，也就是說具有參加禮部貢舉資格的稱